在我們的時代裡

詹宏志

言序選編「選說小篇短年九十六」

當他感覺到時空轉換

不朽的作品常常先屬於一個時代，然後才屬於每一個時代。

但「時代」本來並不存在，誰能說，一九七九的終盡與一九八〇的啓端，那分秒之際是兩個不同的時代？——時代，實在是人類情感中、思維中的象徵結構。

當他感覺到時空轉換，一切熟習的生活倫理、社會秩序、價值信仰都在剎那間失去了舊有的形貌，陌生得令人心畏；當他感覺到人非物非，一場如夢似魘的心底旅程裏，突生「美好昔日」與「迷茫前程」際異之感慨。這時候，乃有所謂的「時代」。

因爲不朽的作品要「先屬於一個時代」，文學乃往往要成爲某種文化產生的表白，或者成爲該文化裏的事件與境況的一種可能反映；當一份文學做到這一點，我們說它是時代精神（Zeigeist）的體現。

所以，小說家（他們也是凡人），當他感覺到時空轉換（和其他人一樣），舊日與今日摩擦矛盾，他能够捕捉整個社會心底深層共存的感情思維，熱情地

或冷酷地將這些「文化主題」宣洩表露出來——這時候，他已「屬於一個時代」。

如果，我忝有資格與前行睿智的編者們併肩而立，這一本「六十九年短篇小說選」正是企圖跟上創辦人隱地先生以來的傳統，再一次努力尋找那些「屬於一個時代」的候選人，將之公諸社會與歷史，接受這個時代與所有的時代的評判。

這種近乎歷史論批評方法的觀點，我揣想或許可以做爲「年度小說選」一個適用的理論基礎。

我看見機器怪手高舉

那麼，在我們的時代裏，是誰有資格成爲眞實的見證？是誰可以用他的作品參與歷史？

我們應該先檢視我們身處的時代，挑出這些因爲「變動」而成爲時代特色的具體事實。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些？但我看見：

1. 所向無敵的怪手機器，正在我們生活的左鄰或右鄰，高擧龐碩的鐵拳，摧枯拉朽地鏟除舊日文明的痕跡……

2. 昔日以生產肥美糧食爲傲的良田，一夕之間廢去了阡陌，插上五彩繽紛的旗幟，改種一種鋼筋水泥的高價值方形作物……

3. 誠實的工作者不再被父母親引爲兒女教育的模範，替代的是那些能以機巧聰明迅速取得財富的投機者……

4. 公司組織企業體的身影愈來愈巨大，彷彿將吸進所有的社會人，並以其巨輪的轉動爲一切心靈作息的根本依據……

5. 聲光文字的各色傳播媒體，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將無數有益或有害的資訊，傾注入沒有抗拒能力的個體，並改洗了他的大腦……

6. 一位出軌的少女，流離在大都會的暗角，她失去了舊日倫理所緊守的價值，却自以爲賺到了新社會的泉源……

……

這些「變局」，這些「時空中的殘酷肌理」，都在我們的時代裏，成爲嚴肅的小說家筆下的世界剖解——廣義地說，誠實的小說家都爲「憂心」而寫作，劉鶚豈不是說：「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在時空推移的變幻中，只有小說家分擔我們的情

怯與畏懼；透過小說家筆下的二次經驗世界，我們再歷了那些感傷與喟嘆，因而減輕了心靈的重負，能够面對一切，在我們的時代裏。

一個普遍的主題

這樣的說法，絕不是提出一個粗陋的綱領，强適履於豐富的文學創作世界；而只是，從六十九年一年的小說裏，我看到的、感動了的許多優秀的作品，共同表現出這樣的特質，我不過是尋找到歸納而來的解釋假說，做爲貫穿這本選集的思考軌道。

在六十九年的短篇小說裏，我選出的一份秀異作品的名單，我認爲足以「屬於一個年度」的代表作品，它們共是九篇，依發表時間順序如下：

1. 高潭村人物誌／鍾延豪作
2. 村人遇難記／舒國治作
3. 人人需要秦德夫／黃凡作
4. 路口／陳若曦作
5. 新來的獅子／吳永毅作
6. 自己的天空／袁瓊瓊作
7. 隔壁親家／廖蕾夫作
8. 小葉／蕭颯作
9. 雞冠花開的時候／唐懷萱作

從幾個角度來看這份名單，當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事實：

1. 以性別而言，這裏有五位男作家，四位女作家；

2. 以年齡而論，陳若曦是比較年長的作家，其他作家都極年輕，絕大部分不滿三十歲；

3. 以寫作方式而言，「村人遇難記」是超現實主義的小說，「新來的獅子」近乎寓言，其餘則爲寫實小說；

4. 以故事發生場所而論，「村人遇難記」的背景非常抽象，「高潭村人物誌」、「隔壁親家」的故事發生在鄉村，其餘則在城市；

5. 以發表刊物而言，它們集中在五個報刊，其中「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篇，「聯合報副刊」二篇，「臺灣時報副刊」二篇，「臺灣文藝」一篇，「現代文學」一篇；

6. 以「功名」而論，這裏有五篇小說是兩大報文學獎的得獎作品，有四篇則否，有五位小說家曾入選

「年度小說」，有四位則是第一次。

這些觀察，當然只是表象，還不能具體說明這份小說名單所顯示的意義，讓我們更進一步來觀察這些小說本身。

鍾延豪的「高潭村人物誌」，以五個片段的故事，企圖爲臺灣的「日據經驗」做一個鳥瞰，人物跨越了三代，時間從日據前縱貫日據時到日據之後，從政治上的日本殖民到經濟上的無形侵略都在討論之列；重心則放在一位發癲的臺籍日本憲兵補，與一位拉警報響筒的工友，他們都在時代的變換中失去自我的認可，或瘋狂或墮落。

舒國治的「村人遇難記」是九篇之中最富實驗性的作品，描寫一個想像的村莊，村人都在堤下的旱田耕作，忽然有一位陌生人出現在堤上，引起堤下村人的種種細微的心理反應，並聯想到許多生活上的經驗與記憶。小說中的角色沒有一個人有名字，除了堤上陌生人之外，也沒有特定的角色；小說的描寫觸及許多人生的基本經驗，詭異突梯，是六十九年的短篇小說中最爲特別的作品。

黃凡的「人人需要秦德夫」，描寫現代經濟社會中一位生活成功與一位生活失敗的人物之對比；成功的是一位叫秦德夫的商人，他充滿侵略性，積極、好強、沒有道德觀念，生活與觀念是一位十足文明社會下的「野人」。另一位失敗者是個律師，因爲年邁而失去愛人，也失去在經濟社會中競爭的鬪志與信心，成爲一個生活上的無能之人。

陳若曦的「路口」是一篇大氣魄的政治小說，透過女主角文秀的歷程，冶臺灣、大陸、美國異地等三種中國人生活經驗與意識形態於一爐。文秀是一位生長在臺灣的女子，爲追隨她臺獨的丈夫到了美國，又因丈夫的失去理想而離開。獨居的日子，文秀遇見一位經濟學教授，在陳映眞案時表現得十分熱心而富正義感，正考慮托付終身時，魏京生案發，這位經濟學教授却爲了個人的政治前途，顯得吞吞吐吐，無法仗義執言。「路口」一文，透過文秀，道盡了政治地理的抉擇之難。

吳永毅的「新來的獅子」，描寫一位動物園裏的工友，平日以打掃動物的居住籠舍爲主要工作；因動物園新運來的獅子在街道上發生車禍而逃出，展開了一場捉迷藏式的追逐，終於將逃出的獅子緝捕回籠。

然而，這位工友却在夜晚，因企圖竊取餵食獅子的牛肉，而喪生於利爪之下。

袁瓊瓊的「自己的天空」，是一位離婚婦女的故事，描寫一位少婦被丈夫遺棄後，如何重建自己的心理與生活，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女性。

廖輝夫的「隔壁親家」，描寫在農村經濟的遷變之下，一位誠實的老農，雖擁有一甲水田與三名後生，却處處不及隔鄰擁有三分旱地和三名千金的粗皮雄仔。這位老農完全無法明白價值變換下的新社會所帶給他的待遇，旱地興建房產獲利百倍於水田，女孩在大都會賣身的賺錢則遠易於兒子賣勞力的掙攢。這一切，在這位一生辛勤的老農眼中，都是不可想像的事。

蕭颯的「小葉」，描寫一位飄零於都市暗角的阻街女子，與另一位在旅館餐飲部擔任領班的男子，發生了的一場短暫的戀情。兩個在都市中不能擁有獨立人格的畸零人，像發燒一樣地產生感情，彼此病態地依賴，却又無情地傷害彼此。

唐懷萱的「雞冠花開的時候」，是一篇批判教育現象的諷刺小說，描寫一所國中裏，學校透過競賽的方式鼓勵儲蓄運動，班級與班級，老師與老師之間，展開一場勾心鬪角的競爭，而競賽的落後班級，却被訓育組長當衆予以無情的羞辱，他們年輕善良的女導師也忍不住而淚下。

九篇小說，呈現了多樣的題材與各異的面貌，彷彿都是獨立的個體。然而細讀其中的意旨，却可以找到一個普遍的主題：「摩擦性的價值失調」。

最後的菖蒲

可以這麼說，六十九年這一年，最敏銳的小說家們共同傾向於關心一個主題，並殊途同歸地從各個角度探進了同一個問題。

因爲時空的推移，舊有的秩序與價值不再完全適用；社會中乃有「價值摩擦」的現象，也產生了一種不適應的「價值過渡人」。廖輝夫的「隔壁親家」所呈現的矛盾，最能表達這個尷尬的情境，阿龍伯身處的社會同時擁有兩套價值，一套是漸失去影響力的傳統價值，一套是日益高漲的摩登價值，習於舊俗的阿龍伯一再以他所信守的價值觀衡量新的事物，乃遭致一再地錯誤，不自覺中成爲一個唐吉訶德式的悲劇人

物。

在其他的小說裏，處處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主題，像黃凡的「人人需要秦德夫」，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淘汰，是一種殘忍的新價值，社會上大部分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挫折、失敗、人格遭踐踏的命運，對於還不知競擇的尖銳眞相的何律師，終不免遭到打擊終至身心支離的局面。

陳若曦的「路口」，則有力地反映了七九、八〇年之交，政治價值混亂不明的情況；在此之前，海峽的東岸、西岸，加上自逐於異國的中國人，都確信自己的選擇，像文秀的母親緊守臺灣的東港，文秀的舅父却堅信移民美國爲宜。然而，對文秀這一代年輕人而言，早一輩的身家仇恨與苦難經驗對她是無法感同身受，而陣營之間也漸有名不符實，難以細分的疑惑，母親、舅父、與情人方豪之間，共同構成一個政治三叉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相對於前一代的確信不移，文秀面臨的正是政治信仰遷移中的「價值失調」，有着兩種以上的價值彼此摩擦競爭着，不知終歸何處。

鍾延豪的「高潭村人物誌」，何嘗不是這個主題的體現？信仰着皇軍聖戰使命的憲兵補頴坤仔，在光復之後，無法面臨自己血緣與信仰的矛盾，終至瘋狂而死於溝洫——這豈不是「摩擦性的價值失衡」的典型寫照。

或者像蕭颯的「小葉」所表現的，小葉與張姓酒店的服務生，同屬於價值推移的矛盾中產生的一種「道德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爲舊價值已然潰朽，新價值尚未建立，信仰的虛無成爲都市暗角中一羣尊嚴被價格擊碎的少男少女們縱慾的基礎，他們想抓住一點「愛」，却不知愛需要「尊重」和「被尊重」，所以也抓不牢。一而再再而三的，他們成爲一種愛情與慾望的游牧民族，沒有定點，也不知方向。

在吳永毅的「新來的獅子」中，林嘉生一人也要面對兩種以上的價值，一種是他在籠子中爲動物撿拾大便，人與獸尊卑難分的境遇；一種是他以不道德的手法（竊取餵食動物的肉類）換取他在家中的尊嚴（母親稱讚他的能幹）。

而唐懷萱筆下的「雞冠花開的時候」，身在價值混亂的社會裏，一位國中教師竟想像一枝菖蒲、一朵雞冠一樣，去驅邪辟毒，對抗扭曲的全世界——殊不

知，公共價值風潮已轉，一個人的力量能抗拒多少都成問題，何況欲挽狂瀾於既倒？

環顧這些優秀的小說，都看見這個主題的突顯在目；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一年小說家最關心的（從量的觀點比較），是社會中的價值遷變，與遷變價值下的不適應者（misfits）。

這個趨勢，應該是國內流行現代主義文學以來最爲成熟的一個反動。國內十幾年前一度流行的現代主義文學最大的遺憾正是價值的虛無，以爲文字的排比可以自足（self-sufficient）；而前幾年鄉土文學運動中，乃以絕對的寫實做爲前期文學的澈底反抗，小說家把現實問題的暴露做爲文學的唯一任務，不免又失之於淺薄。時間的浸潤，乃使文學創作得到較爲調和的路線，一方面它是立基於現實社會的，但另方面它又從現實中抽粹出若干綱領性的思考，實在說，這比質樸無文的反抗時期更進入精緻的一層。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這一年度較諸六十八年那激動的年份（中美斷交），小說上顯得更有收穫。

小說家在我們的時代裏，替我們捕捉那些文化下的共同感情，並型化成文學。不管他們是否自覺，他們的工作確實已爲我們貢獻了許多。小說，並不是所有的效用都這麼嚴肅，但在這一點，却是嚴肅的。

六十九年短篇小說選，如上所述，我選出的正是我曾被感動了的，也是我以爲極可能「屬於一個時代」，甚至，「屬於每一個時代」的作品。它們的共同特徵，也如上所述，正因爲它們都在「我們的時代裏」取材，這些小說可以找到共同的關心，相通的聲息；分別來看，是賞心悅目的小說傑作，整體來看，就是「我們的時代」的眞實心聲與寫照。

除了小說本身以外，是否做爲一份編年史的史料工作，我們也應涉及這一年的小說活動？

一個有趣的觀察（如果不是我的選擇偏見，必然是一個有意義的現象），在入選的九篇小說裏，中國時報副刊的三篇，聯合報副刊的兩篇，都是文學獎的作品；臺灣時報副刊入選的兩篇，則是該刊策劃邀稿的「挑戰擂台」（顧名思義，是向兩大報文學獎挑戰的場外沙龍）；餘下的兩篇，才是專業文學雜誌所發表的。

這種小說的季節性傾向，或者流於策劃性的傾向，究竟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第一、可能是報紙副刊在做完文學獎或小說獎之後，就覺得對小說已盡了義務，其餘時間發表小說的量少，質也不再講求。第二、可能是小說家們養精蓄銳，爲每年百萬獎金的文學角逐而努力，其餘時間，他不願浪費一篇好的作品。

不論原因爲何，都已顯示，文學獎或策劃性的小說刊載，已然影響了作家的創作生態——創作不再是心靈的驅策、或自由的萌芽，而成爲田徑季節式的競賽，與高額獎金的懸賞者。

我無意苛評文學獎的徵文形式，畢竟它也曾爲我們發掘可喜的新人，也曾鼓起小說創作的熱潮，也提供小說創作一個理想的報酬，更引起社會大衆的注目——作家乃像明星一樣。這一切，都證明了文學獎的正面貢獻。

但相對地，當大家把力氣、眼光，都放在文學競技場上的角逐之時，偉大的文學心靈更難能了！

我也無意苛評報紙副刊再也容不下更多的小說或其他文學創作，因爲報紙副刊確實也不是爲小說而生，它們可以去追尋更適合它們媒體形式的表達途徑。

但是，相對的，我們的文學刊物呢？小說刊物與小說出版呢？當報紙副刊不再負擔這樣的任務，我們需要其他媒體來擔任新的角色。

在商業行爲侵入小說創作活動的趨勢更爲嚴重之前，我們有必要提出小說的生態平衡的觀念——揠苗助長的結果，是文學忘記了自己是文學。

三百年以後

「有時我很憂心，杞憂著我們卅年來的文學努力會不會成爲一種徒然的浪費？如果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卅年的我們，他將會怎麼形容，提及那幾個名字？」

我又重複這段曾經發表過的想法，我的意思是這一年的小說家已經盡了他們的力量，那麼未來的一年呢？甚至未來的數年、數十年，小說家們都還要寫下去。當他們感覺到時空轉換，幽不自禁企圖去刮其間的肌理，他們或者可以想到這段話。因爲三百年以後，有人會說：「看哪，就是他們，他們寫下了這些小說！」